

论严复教育思想形成的自身基础

王 民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严复接受了正统的中学熏陶和先进的西学教育, 从事了长达 20 余年的教书生涯, 无疑是他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资本。西方学者斯宾塞、洛克及卢梭的社会有机论和自然主义的教育学理念, 给了严复十分重要的启示。而严复对中国传统教化和洋务教育的理性批判, 则是他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思考。

关键词: 严复; 教育思想; 资本; 依据; 思考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02)04-0106-04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严复的教育思想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 对严复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基础尚缺乏细致的论证, 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个人的教育经历与实践是严复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资本

义和团运动期间, 严复离开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至此他的教育经历与实践可明显地分为四个层次。

1867 年以前, 严复接受的完全是中国正统儒学文化的教育。《严几道年谱》载: 他幼年早慧, 由父亲启蒙, 5 岁至 8 岁间入私塾就读, “先后从师数人”, 并随其五叔父严厚甫举人学习。9 岁时 (1863 年) 师从福州宿儒黄宗彝研习国学, 黄夫子精深汉宋之学, 著有《闽方言》《婆娑词》等书籍, 授徒极为认真。当时黄宗彝的塾馆设在楼上, “每夜楼下演剧, 布衣辄命就寝。剧止, 挑灯更读, 其严如此”。在严格的训练下, 严复“始治经有家法, 饴闻宋元明儒先学行”, [1] (P3) 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底。1866 年, 严父病卒, 家道中落, 恰逢左宗棠、沈葆楨在马尾创办船政局, 年末, 其附设的船政学堂招生, 严复前往报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这便是对严复早年学习的最好肯定。

接下来的 10 年中, 严复先在船政学堂受到了西学与中学双重的新式教育, 学堂课程的设置, 反映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价值取向, “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2] (P1546) 除此以外, “令读《圣谕广训》《孝经》, 兼习论策, 以明义理”。[3] 通过 5 年的刻苦学习, 严复“以最优等卒業”。[1] (P3) 之后随舰队在中国

沿海、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进行了 5 年的教育实习。10 年寒窗不仅使严复增长了中西文化的知识, 而且也大大地丰富了他的社会实践阅历。

1877 年至 1879 年严复被派赴英国留学,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的教育体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严复思想的影响极为深刻。严复在英的学习内容主要是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以及舰船驾驶知识, 他对“声光电化”等科学知识的广泛应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因此学习勤奋, “考课屡列优等”。[4] 并且, 严复“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 更能探本溯源”, [5] (P143) 他思索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科学技术, 而是注意到了社会的因素, 甚至涉及到教育问题。他注意观察体验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 对异国的皇宫、法庭、学校、科学机构、城市建设、博览会等方面都做过比较深入的了解, 还经常与驻英公使郭嵩焘“论析中西学问同异, 穷日夕弗休”。[6] 此时严复思想的升华已露端倪。所以有学者据此推测, 大概从那时严复就开始阅读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了。[7] (P9) 梁启超则断言: “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 复其首也”。[8] 可以说, 严复在留英期间对西方社会的亲身感受, 为他日后科学理性思维和教育价值观念的成熟颇具影响。

1879 年 8 月, 由于船政学堂缺乏教师, 严复被调回国任教。1880 年, “李文忠伟其能, 辟教授北洋水师学堂”, [6] 此后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20 年, 历任总教习 (教务长)、会办 (副校长)、总办 (校长), 使得他对所接受的中西文化教育有了一个消化与传授、实践与检验的过程。这一

收稿日期: 2002-02-21

作者简介: 王 民 (1954-), 男, 山东龙口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过程在严复的全部教育经历中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有两点很值得一提。首先,严复有充足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学习与进行深入的思考。“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尝言生平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他接受斯宾塞的学说就产生于此时。其次,由于严复长期主持学堂的教务工作,对中西教育的模式、方法、内容等方面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这就为严复能亲自比较中西教育的优劣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据严璩记载:“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2](P1547)他“常柴车野服,往来于京津之间”。[9]为水师学堂的健全与发展奔波劳碌,培养了许多合格的海军将才与技术人员。《光绪政要》中详细记载了学堂的办学情况,“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学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欲其于泰西书志,能知寻绎,于是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欲其于凡诸算学,洞见源流,于是授以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欲其于轮机炮火备谙理法,于是授以级数数学;欲其于大洋驾舟,测日候星,积算晷刻以知方向道理,于是授以天文推步地舆测量;其于驾驶诸学,庶乎明体达用矣。然后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犹虑其或邻浮薄也,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淪其灵明,郎以培其根本。为之信赏必罚,以策其倦怠,为之月校季考以稽其知能。盖自开棠以来,一日间以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暑分时,兼程并课。数更寒燠,经季考诸生课业,月异而岁不同,实开北方风气之先”。[10]因此,这20年的教职生涯是严复学以致用、逐步形成其教育思想的十分重要的阶段。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教育经历与实践必定会对其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严复在这方面的丰富程度和绝对优势是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国人所无法比拟的。他在40余年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接受了正统的中学熏陶和最先进的西学教育,从事了长达20余年之久的教书生涯,毫无疑问为他教育思想的形成夯实了基础。这不仅是严复教育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更可认定是严复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资本。

二、西方学说的启示是严复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
严复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是直接取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其中最大的影响要属斯宾塞的社会教育学理念。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著有1861年出版的《教育论》一书(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该书是由四篇短文汇集而成,首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于1854年发表,次篇《论智育》于1859年发表,后二篇《论德育》和《论体育》于1861年发表。首篇倡言教育的目的是完美生活的预备,一切知识以其贡献于完美生活的效用而定其价值的高低,由是拟定了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以下各篇分论智育、德育、体育等三方面的原理和方法。其中有许多看法是符合时代的要求和教育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当时对科学知识价值的认识、对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的运用以及对以

往教育思想的扬弃。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就提到:“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11](P17)严复先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对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做了细致的考察。他引用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与生物机体一样,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11](P17)“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盛衰之迹,特皆如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耳,夫固有为之根而受其蕴者也”。[12](P7)总体的属性等于个体的属性相加,“其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总之形法性情,欲论其合,先考其分,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11](P18)他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说:“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13](P126)据此,严复提出了资产阶级培养年轻一代的基本教育内容,即体育、智育、德育。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1](P18)严复提出的三育思想,将培养德、智、体“三强”的人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显然是从斯宾塞的社会教育理念中得到的启示。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国民,他们的力、智、德三者的高下,决定了群体和国家的强弱存亡。与此相反,如果国民“契需恟恟,各备其私”,“则其群将涣”,这样的民族国家,不需要用武力消灭,“磨灭溃败,出于自然”。在这里,严复接受并宣传了斯宾塞的思想,并初步形成一“种”或一“群”之所以强,不在于政治革新,不在于革命,而在于逐步提高民众力、智、德素质的观点。显然,在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唤起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时,他的“力、智、德”三育论兼有政治哲学和教育理念的双重意义。

洛克和卢梭的教育理念也对严复有很深的影响,他们从“天性论”角度出发来提倡家庭的教育与重视儿童的启蒙,严复对此思路十分赞成。他说:“吾尝读英洛克氏、法卢梭氏诸教育书,见其和蔼惻怛,大异平日反对政府之文辞。然皆大声疾呼,谓非是则国种决灭”。[14](P255)

约翰·洛克(1632-1704)是英国学者、哲学家、政治家、教育理论家。其教育著作主要是《教育漫话》,此书原本是他为友人儿子的教育问题而写的书信,1693年正式出版,很快风行欧洲,到18世纪末,此书在英国出了10版,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洛克论证并发挥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论”。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因而人人都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人人都可以在丰富与完美的环境中纵情地吸取经验。他极力主张通过家庭教育将儿童培养成“高贵的人”,有强壮的体魄,有智慧与才干,有高雅的风度举止,能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事业家”与“国家要人”。[15](P119)严复将“白板论”译为

“白甘”，他说：“智慧之生于一本，心体为白甘，而阅历为采和，无所谓良知者矣”。[16]（P1050）就是说，人的心灵犹如一页白纸，上面没有任何标记、任何观念，所有的观念和知识都是从“阅历”（经验）而来，所以根本无所谓“良知”（天赋观念）卢梭（1712- 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学家。他于 1762 年著成《爱弥尔》，以小说题材讨论中学生爱弥尔的教育问题。严复对卢梭是十分了解的，他曾介绍说：“卢梭者，瑞士之几泥洼人也，其生去今二百年矣。家至贫贱，困苦殆不足自立，然好读古书，能为文。千七百四十九年，法之南部曰地棠学校者征文发策，问文物礼乐之事果所以进民德者乎？卢梭奋笔为对，其说大似吾国之老庄。见者惊叹乃曰有名。越五年，而《人类等差原始》之书出。又八年，而《民约论》、《教育说》诸书见于世”。[17]（P333）尽管严复对卢梭的政治学说以为不然，认为是“误人者，以其动于感情，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17]（P340）故尔极力反对。不过他对卢梭从天性论出发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却颇为赞赏，认为“和蔼愷恻”，是改造社会的良方。他同意教育“归于自然”，顺遂天性的自然发展。“要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要人成为天性所造成的人，而不是人所造成的人。同时我们注意到，严复为了增强说服力，还对自然主义教育理念作了“中西会通”的阐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而西儒洛克亦曰：‘人类上智下愚而外，所以成其如是者，大抵教育为之，故教育之所成者，人之第二性也’。古今圣智之人，所以陶铸国民，使之成为种性，而不可骤迁者皆所以先入之道得耳”。[18]（P201）因此，严复强调应从儿童开始进行体育、智育和德育的教化，以从源头上提高国民的素质。“夫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14]（P255）这一看法显然就是西方自然主义教育的理念。

三、对中国传统教化和洋务教育的理性批判是严复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思考

1895 年严复在《救亡决论》的结尾说道：“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那么，中国的“教化学术”落后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是严复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思考之一。他的切入点是拿起“西学”的武器对“旧学”进行了学理上的批判。严复对“旧学”的学理批判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到“旧学”的诸多内容；二是在批判的过程中向外寻找新的观念与事实，并且努力与解决中国教育现状问题的要求联系起来。

首先，严复抨击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揭露了八股的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指出，这三大害，只要有一害在，“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19]（P41- 43）八股培养的人才，既不能练兵，也不懂通商，更不晓得如何兴办新政，这样的人才终致国家于危亡而已。其次，严复指出八股之所以禁锢士子智慧，在于它赖求训诂，脱离现实。他对当时“旧

学”的诸多内容，如：义理心性、考据笺注、词章文字、写作形式等等都一一加以批判。他认为诸如此类的“旧学”，“一言以蔽之，曰‘无用’和‘无实’，均无补于救亡。因此他主张，国家处存亡危急之秋，欲求自救之术，“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19]（P44）再次，严复认为“陆王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对提倡格致（科学）阻力最大，“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说，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则大不可”。[19]（P44）他质疑道：“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向壁虚造，顺非而泽，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惟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19]（P44- 45）在这里，严复对“陆王心学”的所谓学术及其方法往往不经过事实的验证，就强扭客观实际趋奉主观意识的治学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严复看来，旧学为祸，“始于学术，终于国家”。在救亡前提下，严复之所以否定八股旧学，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号召国人提倡西学和学习科学。他断言：“然则救亡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19]（P43）他还说：“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瞽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19]（P46）严复关于废除八股、束中学于高阁和大讲西学格致的这些主张，不是随意提出来的，而是经过深入了解了中西方的“学术教化”，并且比较了中学和西学的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之后才得出来的结论。

对洋务教育的理性批判是严复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又一重要思考。洋务派从 19 世纪 60 到 90 年代，兴办了 30 多年的洋务教育，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可以说是个冲击和变革。洋务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除了传统的学科之外，还增加了格致和外语，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也有不少改进，客观上对传播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近代新式教育，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教育主旨是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之上，即以坚守中国的经史义理之学为主，以传授西方实用科学为辅，这就导致洋务教育中出现了种种的矛盾与不协调性。严复尤其对洋务派不彻底地学习西学的教育主旨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严复驳斥说，体与用是统一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所以，中西学之间的差异，“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20]（P558）有人硬将中学的“体”与西学的“用”“欲合之而以为一物”，是不可行的。对于“西政为本，西艺为末”说，他指出，那更是“颠倒错乱者矣”，因为西方政治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今日政治之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是因为“坐不

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所以说“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20](P559)洋务派曾经学习西方的天文、地质、医药、农矿、舟车、兵治等“富强之实资”,但无一成效,这是因为他们“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科学却又急于讲政治,“此国财之所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对于“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他认为这只是一种中庸之道。他举例说,中学与西学是不同事物,所以两者不能合为主辅。如果硬把中学作主,以西学辅其不足,“将无异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他批评洋务派以此作为教育主旨那只是枝节的改革,必然导致教育新政的流产,“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诿怪。不知方其造谋,其无成之理,固已具矣”。[20](P560)所以“中西主辅之说”也是行不通的。

显然,严复已经十分明确地认定,把中学和西学看成是体用关系、主辅关系,把西政和西艺看成是本末关系,都是不妥当的。如果仍“以为当然,循而用之”,结果“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误之,殆无幸已”。[20](P558)严复批驳了这些“中体西用”、“中主西辅”等文化教育主张以后,提出了对中学和

西学教育的辨证思考:“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继自今,凡可以瘡患者,将竭力气鞭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20](P560)“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若夫吾旧有之经籍典章,未尝废也”。

[20](P562)由此可见,严复对中学和西学教育辩证关系的理解十分深刻,这个文化教育主张既不是将中学和西学按“体用”或“主辅”的作用进行简单的凑合,也不是“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的全盘西化论。西学虽然是今后社会的发展潮流,但中学(旧学)“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如果将其废去,“则其民之特性亡”,所以要“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20](P560)这实际上是一种开放性的“中西会通”式的文化思维。当然,严复认为要达到这一理想,“尤以瘡愚为最急”。[20](P560)因此,教育的方方面面就自然地成为了严复终身追求的目标之一。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拥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实践,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教育理念,对中国教育现状的理性批判与思考,是严复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自身基础。

注释:

笔者认为,严复的教育思想至迟形成于1902年,故他在安庆学堂、复旦公学、北京大学的教经历可从略不赘。

参考文献:

[1] 王遽常. 严几道年谱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2] 严 璩. 严复集. 第 5 册: 侯官严先生年谱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 沈葆楨. 沈文肃公政书. 卷 4 总理船政沈葆楨折 [Z].
[4] 黎兆棠折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A]. 船政奏议汇编: 卷 18 [C].
[5] 薛福成. 出使四国日记 [Z].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6] 陈宝琛. 碑传集补. 卷末: 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Z].
[7] 王 斌. 严复传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8]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第二十九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9] 林 纾. 畏庐文集: 尊疑译书图记 [A]. 畏庐文集 (古文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10.
[10] 光绪政要: 第 5 册: 卷 7 [Z].
[11] 原强修订稿 [A]. 严复集: 第 1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2] 原 强 [A]. 严复集: 第 1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3] 群学肄言. 译余赘语 [A]. 严复集: 第 1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4] 蒙养镜. 序 [A]. 严复集: 第 2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5] [英] 洛克. 教育漫话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16] 穆勒名学. 部乙案语 [A]. 严复集: 第 4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7] 民约平议 [A]. 严复集: 第 2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8] 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 [A]. 严复集: 第 1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9] 救亡决论 [A]. 严复集: 第 1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0] 与外交报主人书 [A]. 严复集: 第 3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责任编辑: 黄艳林]